

浅谈克罗齐的浪漫主义史学观

唐杰培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市, 10080)

摘要: 贝奈戴托·克罗齐作为二十世纪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家与美学家, 其思想体系中蕴含的浪漫主义史学观, 构成了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本文旨在梳理克罗齐史学思想的核心脉络, 着重剖析其“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著名论断的哲学基础与浪漫主义意蕴。文章首先将克罗齐的史学观置于其精神哲学体系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审视, 阐明历史与哲学的同一性关系。其次, 重点探讨克罗齐史学思想中浓厚的浪漫主义特征, 表现为对历史主体精神的张扬、对直觉与理解的推崇以及对个体性与特殊性的强调。进一步, 本文将克罗齐的浪漫主义史学观与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进行对比, 揭示其试图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二元对立的努力。最后, 文章将对克罗齐史学观的贡献与局限进行评价, 并思考其对于当下历史研究的启示意义。克罗齐的史学观并非简单的历史相对主义, 而是一种强调历史知识生成中主体精神参与的历史哲学, 其浪漫主义底色使其在强调历史科学性的同时, 从未放弃对历史“诗意”与“人性”的追求。

关键词: 克罗齐; 浪漫主义史学; 当代史; 精神哲学; 历史理解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在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谱系中, 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之转折处, 贝奈戴托·克罗齐的身影显得格外醒目。他的历史思想, 如同一股源自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传统却又经过严格哲学锻造的激流, 猛烈地冲击着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堤坝。克罗齐并非职业历史学家, 然而正是这种哲学家的视角, 使他能够跳出具体历史编纂的技艺层面, 直指历史知识的本性这一根本问题。他提出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命题, 既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也招致了诸多的误解。

国内学界对克罗齐的研究, 多集中于其美学领域, 对其历史哲学的探讨虽有一定积累, 但往往侧重于对其“当代史”观念的反复阐释, 或将其简单归入历史相对主义或主观主义的阵营进行批判。实际上, 克罗齐的史学观是一个融汇了意大利本土维科传统、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以及十九世纪历史主义精神的复杂综合体, 其中流淌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血液。这种浪漫主义并非情感上的无节制泛滥, 而是一种深刻的哲学立场, 它关乎如何理解历史中的自由、精神与个体生命。[1] 本文尝试重返克罗齐的文本语境, 将其史学思想明确标识为一种“浪漫主义史学观”, 并系统梳理其内在逻辑与表现形式。这一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克罗齐的思想全貌, 也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二十世纪历史哲学的演变

一、 哲学与历史的同一: 克罗齐史学观的基石

要理解克罗齐的浪漫主义史学观, 首先必须进入其宏大的“精神哲学”体系。在克罗齐看来, 精神是唯一的实在, 整个世界无非是精神活动的表现与产物。他将精神活动分为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两大领域, 前者包含直觉(美学)与概念(逻辑), 后者包含经济(功利)与道德(伦理)。这四种活动构成了一个永恒的循环: 直觉产生个别意象, 概念对之进行逻辑思考, 经济活动追求个别利益, 道德意志则追求普遍利益。历史, 在这个体系中占据着一个独特而崇高的位置。

克罗齐坚决反对将历史视为一种独立于哲学的具体科学。他认为, 传统上区分“历史哲学”(寻求规律)与“历史编纂”(记录事实)的做法是虚妄的。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

中，他明确指出：“历史既不是关于‘个别’的科学，也不是关于‘普遍’的科学……它是关于‘具体的普遍’的科学。”[2]这意味着，历史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思维。历史学家面对的具体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等待被记录的原材料，而是已经被精神（理解者的精神）所照亮、所组织的“具体的普遍”。例如，当我们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我们无法脱离“自由”、“平等”、“民主”、“暴力”、“现代性”等普遍概念来理解那些具体的人物与事件；反之，这些普遍概念也唯有在法国大革命的具体叙事中才获得其丰满的血肉与生命。历史判断因而同时既是事实判断，也是价值判断；既是对个别性的叙述，也蕴含着普遍范畴的运用。

这种“历史与哲学的同一”命题，从根本上颠覆了实证主义史学“如实直书”的迷梦。实证主义史学幻想历史学家可以像自然科学家处理标本一样，排除自身的主观性，客观中立地复原过去。克罗齐则认为，这种排除恰恰使历史丧失了灵魂，沦为年代纪或文献汇编。真正的历史理解，必然要求理解者将自身的精神、价值关怀与时代问题投入其中，与过去进行对话。过去之所以能对我们“说话”，并非因为它本身是凝固的实体，而是因为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需要对它进行追问与回应。这便是“当代史”的第一层含义：历史研究总是源于当代的精神兴趣与需求。没有现实生活的激发，任何过去都不会自动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2]克罗齐以罗马史研究为例指出，不同时代（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族统一运动时期）对罗马史的兴趣与解释截然不同，这些差异并非历史学的缺陷，而恰恰证明了历史是活的，是精神在时间中不断自我认识的过程。

由此可见，克罗齐为历史学奠定的基石是彻底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他将历史的本质从外在的客体拉回到进行理解的主体精神内部。这一立场，为浪漫主义史学观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哲学舞台。浪漫主义的核心之一，正是对主体性、内在性与精神的极度高扬。克罗齐接过这一火炬，将它燃烧在历史认识论的领域。

二、浪漫主义的显现：主体、直觉与个体性

在确立了精神本体论与“历史哲学同一论”的基础上，克罗齐史学观中的浪漫主义特征便清晰地浮现出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历史中主体精神的无限张扬。克罗齐的历史，本质上是“精神的历史”。他所关心的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进程或社会结构的机械运动，而是人类精神的创造活动——艺术、思想、制度、道德行动。历史进步的标志，并非物质财富的累积或技术的革新，而是精神在追求自由与自我意识道路上的展开。这种将历史主角定位为“精神”或“自由意识”的做法，直接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同时也与浪漫主义将历史视为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之演化的思潮一脉相承。然而，克罗齐摒弃了黑格尔那个具有目的论色彩的“世界精神”及其预定的辩证图式。他的精神是内在的、开放的、永远在自我创造中，没有终极的“末日审判”。历史的每一时刻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都是精神自我实现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瞬间。这种对历史进程中每一精神形态之独特价值的肯定，充满了浪漫主义对于生命丰富性与创造性的礼赞。

其次，是推崇“直觉”与“理解”在历史认识中的关键作用。作为美学家，克罗齐将艺术（直觉）视为精神活动最初也是最基本的阶段。这种美学思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史学观。他认为，优秀的历史著作应该具有艺术作品的某些特质，比如具体性、生动性与整体性。历史学家不能仅仅依靠逻辑推理和因果分析，他必须能够“直觉”到历史人物与时代的内在生命，能够“移情”式地理解他们的情感、动机与困境。克罗齐强调“理解”而非单纯的“解

释”。解释寻求的是外部的、机械的原因，如同自然科学的因果律；而理解则要求进入行动者的内在世界，把握其行为的意义。例如，要理解拿破仑的某一决策，仅仅罗列政治军事形势是不够的，必须试图把握拿破仑当时的意图、权衡与信念体系。这种对“理解”方法的强调，与狄尔泰等人的解释学传统相通，也体现了浪漫主义史学反对用冷冰冰的理性解剖历史，主张用同情和想象去把握历史生命整体的倾向。

再次，是对历史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执着坚守。浪漫主义反抗启蒙普遍理性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捍卫个体、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与不可化约性。克罗齐将这一立场贯彻到底。他激烈批判一切试图从历史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如社会进化规律、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哲学”，认为那是对历史实在的粗暴简化。历史中的每一个体、每一事件、每一时代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个体”，是“具体的普遍”之体现。历史学家的任务，正是运用普遍概念（如国家、革命、阶级）来理解和叙述这种独一无二的个别性，而不是将个别性强行塞进普遍规律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这种对特殊性的尊重，使得克罗齐的历史观具有强烈的反教条、反决定论色彩。历史在他眼中是自由的领域，充满了偶然、选择与创造，而非由某种铁律预先决定的轨道。这种对历史开放性、不确定性的强调，无疑蕴含着浪漫主义对自由意志的深切信念。

三、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对话及超越

克罗齐史学观的浪漫主义特质，在其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鲜明对比中，显得尤为突出。可以说，他的整个历史哲学体系，正是在与这一强大对手的持续对话与批判中建构起来的。

实证主义史学追求历史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其理想是让史料自身说话，历史学家则应尽可能克制个人情感与价值观，以达到“消灭自我”的至高境界。兰克那句著名的“如实直书”，成为这一学派的旗帜。在方法论上，它极度依赖考据、辨伪、史料批判等“科学方法”，相信通过严格的史料操作，可以重建过去的客观真相。[4]

克罗齐从根本哲学层面上解构了这一理想。他认为，史料（文献、遗迹）本身是沉默的，是死的东西。它们只有被现代活跃着的精神所唤醒、所质疑、所诠释时，才成为“证据”，才进入历史知识的范畴。所谓“客观事实”，并非先于理解而存在，它恰恰是理解活动的产物。历史学家在选择史料、组织叙事、进行解释时，他的整个精神世界——包括其知识背景、价值观念、时代问题乃至个人气质——都已经参与其中，无法剥离。因此，绝对的、价值无涉的客观性是一个幻象。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不在于排除主观，而在于这种主观是经过严格哲学批判与史料训练的、严肃的、负责任的精神活动，是“主观性达到了普遍性高度的客观性”。例如，面对同一批关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档案，一个启蒙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历史学家和一个关注权力与反抗的社会史家，可能会构建出迥然不同的历史叙事，并赋予这些史料以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克罗齐看来，这并非历史的悲哀，而是历史的常态。重要的不是幻想消除这些视角差异，而是要求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坦诚自己的视角，并运用理性与证据，使自己的解释成为一个在学术共同体中可以对话、可以批判的“当代”思想建构。

此外，克罗齐批评实证主义史学沉溺于琐碎的考据，将历史降格为“编年史”或“文献学”，丧失了把握历史活生生整体与意义的能力。浪漫主义史学所珍视的“整体感”、“生命感”与“意义感”，在实证主义的碎片化研究中被消解了。克罗齐则主张，真正的历史综合必须建立在哲学思考之上，必须能够把握住一个时代、一个运动的精神核心。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克罗齐并非要完全抛弃实证主义史学的遗产。他高度尊重史料批判的技艺,认为那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基础。他所反对的,是将这种方法论基础错误地提升为历史学的全部本质。他的浪漫主义史学观,试图在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教条”与彻底的历史怀疑论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既承认历史知识中不可避免的当代性与主观性成分,又坚持历史研究必须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与理性批判精神,从而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具有思想活力的“真”。

四、评价与余论:贡献、局限与当代回响

克罗齐的浪漫主义史学观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图景中留下了深刻的刻痕。其贡献是多方面的。第一,他以雷霆万钧的哲学之力,彻底动摇了实证主义史学不证自明的霸权地位,将历史认识论问题推向了前台,开启了分析历史哲学的先声。后来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著名命题,直接受惠于克罗齐的思想滋养。[3]第二,他高扬历史中人的精神与自由,捍卫历史的个体性与特殊性,这对于抵抗各种形式的决定论(无论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还是科学主义式的)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意义。第三,他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当代史”命题提醒我们,历史学从来不是象牙塔中的古董鉴赏,它始终参与着现实文化的塑造与时代精神的建构。[6]第四,他强调历史理解中直觉、想象与同情的作用,平衡了历史学中科学与艺术、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张力,维护了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独特品格。

然而,克罗齐的思想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局限。首先,其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有将历史完全化约为观念史或精神史的危险。社会经济结构、物质生活条件、自然环境等“非精神”因素,在他的体系中或被贬低为精神的低级阶段(经济活动),或被边缘化。这使其历史观在处理大规模社会变迁、经济动力等问题时,显得解释力不足。其次,尽管他试图调和主观与客观,但其理论重心过于偏向理解者的当代精神,存在导向极端相对主义或“当下主义”的隐患。如果历史的意义完全由每一代人的当代关切所决定,那么是否存在衡量不同历史解释优劣的标准?历史知识的积累与进步是否可能?克罗齐对此的解答——诉诸精神自身不断发展的辩证法——在一些批评者看来,仍嫌抽象与模糊。最后,他对“具体普遍”的历史叙述的理想,在实践中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它要求历史学家同时是深刻的哲学家与敏锐的艺术家,这几乎是一种“天才史观”,难以成为普通历史工作者的日常方法指南。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克罗齐的浪漫主义史学观并未失去其生命力。在当代史学理论关于“叙事”、“表征”、“记忆”与“客观性”的持续争论中,克罗齐的声音依然回响。后现代史学对历史文本性、建构性的强调,在某些方面可以视为克罗齐思想的激进延伸。同时,在全球史、微观史、情感史等新兴领域,我们也能看到对历史个体经验、文化独特性与理解方法的重现关注,其中依稀可见浪漫主义史学的余韵。

对于我们今天的历史学习者而言,克罗齐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提供一套可机械套用的方法,而在于作为一种深刻的提醒与激励。他提醒我们,历史研究是一项需要投入整个心灵、与过去生命进行精神对话的创造性事业;他激励我们,在娴熟掌握实证技艺的同时,永远不要失去对历史之“诗意”与“人性”维度的敏感与追求。在数据与技术日益主导研究方式的今天,这份浪漫主义的思想遗产,恰似一剂平衡的良方,让我们在追求历史之“真”的路上,不忘历史之“美”与“善”的维度。这或许正是克罗齐那充满激情与哲思的浪漫主义史学观,穿越一个世纪的尘埃,依然能向我们发出的、最具当代性的叩问。

参考文献

- [1] 王晴佳. 西方的历史观念: 从古希腊到现代[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 [2] 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 傅任敢,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3] 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M]. 何兆武, 张文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4] 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 何兆武, 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 [5] 张广智, 张广勇. 史学: 文化中的文化[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 [6] 克罗齐. 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M]. 田时纲,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A Brief Discussion on Croce's Romanticist Historiography

Tang Jiepei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0)

Abstract: Benedetto Croce, as an enormously influential philosopher of history and aesthe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veloped a romanticist view of history within 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that constituted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and critique of nineteenth-century positivist historiography. This paper aims to delineate the core tenets of Croce's historical thought,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analyzing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and romanticist implications of his famous dictum, "all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 The article first situates Croce's historiographical views within the overarching framework of his philosophy of spirit, elucidating the identity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t then proceeds to examine the strong romanticist features inherent in Croce's thought, manifested in his celebration of the subjective spirit in history, his emphasis on intuition and understanding, and his insistence on individuality and particularity. Furthermore, this paper contrasts Croce's romanticist historiography with Rankean positivist historiography, revealing his endeavor to transcend the dichotomy between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Finally, the paper offers an assessment of the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Croce's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 and reflects on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research. Croce's historiography is not a simplistic historical relativism but rathe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at underscores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subjective spiri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ts romanticist underpinnings ensure that, while affirming the scientific character of history, it never abandons the pursuit of history's "poetic" and "human" dimensions.

Keywords: Benedetto Croce; Romanticist Historiography; Contemporary History; Philosophy of Spirit;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